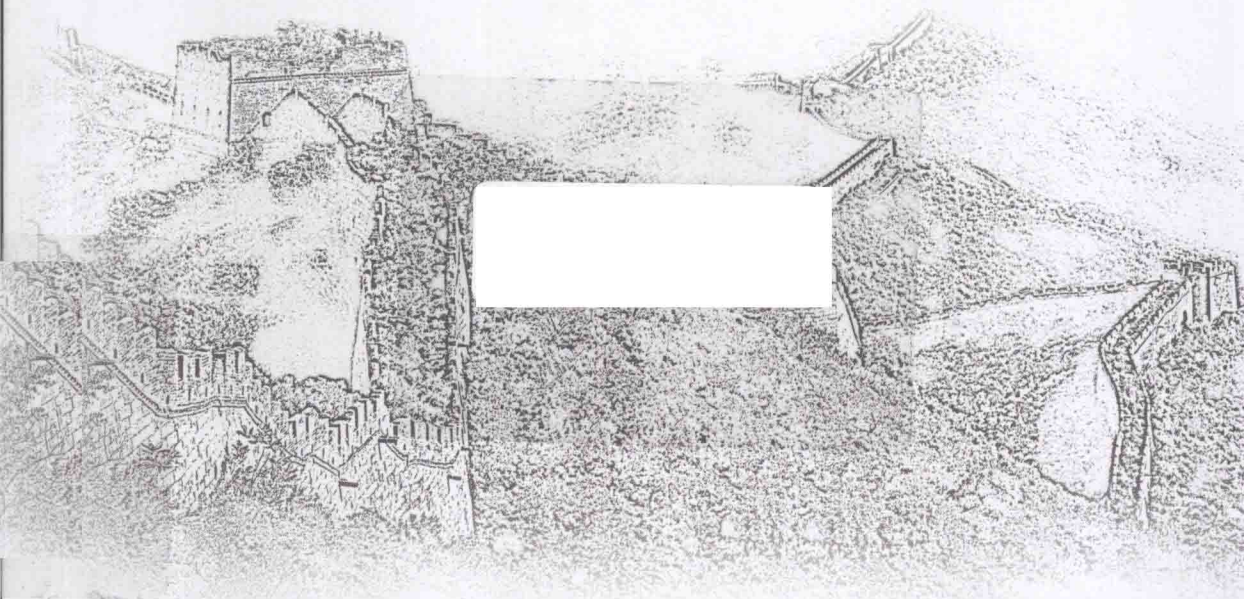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论要

主 编 王联斌
副主编 卫 琦
马 坤



 白山出版社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论要

主 编 王联斌
副主编 卫 琦
马 坤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论要/王联斌主编.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5529 - 0578 - 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军队 - 道德修养
- 研究 - 中国 IV. ①E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966 号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论要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 - 28865926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张永剑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戴邦新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29 - 0578 - 6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打造强军文化的重要精神血脉

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努力打造强军文化，不能不重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价值。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中华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魅力和使命。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先于儒、墨、道、法等诸子文化而产生，集百家文化之优长而发展的；是中华军事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历代军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家园，代表着中国军人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不竭源泉，打造强军文化的精神血脉。

人民军队要打造的强军文化，就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德文化和人民军队红色文化之大成”^①的文化体系。强军文化，要在强军，唯能强军的文化才是可贵的，才是值得继承的。在中国，历经数千年军事实践打造出来的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治军制胜规律的总结，反映了强军的根本诉求。如精忠报国、捍族为民、和军勇胜、效命战场、进死为荣、安不忘战、以战去战、师出以律、爱兵如子、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明赏罚、精武艺……皆是制胜之精神品性、治军之文化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②

人民军队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

^① 见《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解读》，《解放军报》2014年11月24日第1版。

^② 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01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



是一个民族性认知范畴。任何民族性认知，都必然以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为基础。尤其在“礼义之邦”的中国，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凝聚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归宿感，是传承民族品格的永恒主题，形成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血脉和源泉。所以，它责无旁贷地承载着永葆军事文化民族品格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必然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打造强军文化的价值担当。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中国化的强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军事文化的民族化，它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深深浸蕴着浓浓的大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馨香。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相结合，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打造强军文化不可绕过的必然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相承接，是红色文化之武魂——先进武德文化，亦即先进军事文化的显著特征。军事文化体系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即以军人思想道德为基干的武德文化和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武德文化是军事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导向，规定着军事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因此，打造先进武德文化是推进先进军事文化繁荣发展、打造强军文化的必然要求。人民军队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见证了这一路径选择的正确性。

我们不会忘记：早在井冈山时期，体现先进军事文化本质要求的人民军队武德风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大多可以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找到它的源流。

我们不会忘记：早在延安时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就策划编写了以武德治军为要旨的《戚继光治兵语录》和具有丰富武德内涵的《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典籍合为一书——《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丛书》，在延安出版发行；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还出版重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八路军干部学习参考。《曾胡治兵语录》中的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等章，皆是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之大成的名篇。正是这些具有丰富武德文化内涵的名著、名篇，对人民军队先进武德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民族文化寻根、认同和奠基作用。在毛泽东、朱德等诸多军事著述中，亦清晰地呈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对传统武德文化借鉴吸收的墨迹。

我们不会忘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强调指出，全党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他尖锐地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忽视中国历史的倾向：“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

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只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老祖宗”相结合，才能被广泛地认同、接受和遵循，才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也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毋庸置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武德文化是打造强军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中国化不可或缺的精神之源。

今天，我们更要看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着力抓好战斗精神的培育，努力培育尚武、练武、精武的战斗文化，养武德、塑武魂、扬武威，锤炼军人的胆气和血性。这就更需要注重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激发官兵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崇尚的热情与诉求，陶冶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武德情操和血性胆识，使广大官兵更加自觉地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

作 者

2015年1月于上海

【目 录】

导论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001
一、武德的产生与价值诉求	001
二、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基本规范体系	004
三、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两大主线	009
四、国防精神建设的永恒主题	012
第一章 论卫国	014
一、“兵者，国之大事”	014
二、“执干戈以卫社稷”	020
三、“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024
四、“忠孝两全”与“移孝全忠”	031
五、制胜之道	035
六、安不忘战，忘战必危	043
第二章 论爱民	050
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	050
二、“唯人是保”：军事仁本主义	059
三、从爱民走向军事人道主义	067
四、“教”与“爱”的统一	072

第三章 论爱卒	075
一、用兵之道，在于人和	076
二、“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081
三、“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087
四、“卑身下士，齐勉甘苦”	093
五、善待降卒，礼遇战俘	099
第四章 论仁智	106
一、仁为兵本	106
二、仁者无敌	114
三、兵家第一德	118
四、智仁统一论	124
第五章 论义勇	131
一、“义兵之为天下良药”	131
二、“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135
三、仁勇、智勇与“匹夫之勇”	140
四、“率义之谓勇”	146
第六章 论军纪	153
一、“师惟律用”	153
二、“誓”、“礼”、“刑”、“律”、“令”	159
三、“勒兵者必以法令”	166
四、“明刑罚，正劝赏”	171
五、教而后刑，亲而后律	177
六、“顺命为上”与“君命有所不受”	181
第七章 论励士	185
一、贵在“治气”	185
二、教礼·练艺·励士	189
三、“励气”与“夺气”	197
四、“治心”与“励气”	203
第八章 论荣辱	210
一、“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210
二、求荣避辱，荣辱大分	214
三、“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	221

四、武德之荣：内涵与魅力	229
第九章 论将德	235
一、“社稷安危，一在将军”	236
二、“德者，兵之手也”	242
三、将德律：倡与戒的定格	248
四、为将之道，得之于德	256
五、识将还须请诸葛	263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69

导论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所谓武德，即是从武、用武、尚武之应有德性，泛指在以国防军事为基础的武事活动中形成并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稳定的伦理思想、道德传统、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行为品质的总和。军人武德是军人在职业活动中形成的，是军人思想道德、行为品质的总概括。研究和继承中华武德文化优秀传统，对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构建我军先进武德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武德的产生与价值诉求

（一）武德概念考源

武德的概念，从内容来看，早在上古炎黄氏族融合时代就产生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就是说，黄帝不仅重视武（振兵），而且非常重视德（修德）。虽然这里所修的德并不完全是武德，但轩辕黄帝能够把修德与振兵结合起来，已朴素地认识到武与德的辩证统一性。又据《韩非子·五蠹》说，尧舜时代，有三苗不服，禹准备攻伐，舜说：“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这说明尧舜时代，就已经重视了“武”与“德”的结合，并将此视为养兵用战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法则。

至先秦时期，“武德”一词开始以军旅德性的专用语出现在典籍中。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武有七德”说系出于楚庄王之口。所谓“武有七德”，就是说“武德”有七条规范要求或七个方面的表现，即：“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与“德”二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晋语九》：“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这里所说的“武德”即是指在养兵用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德性。《尉繚子·兵教》说：“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此处的“武德”指军人的历史使命，即责任、义务和军人的价值。史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煇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①

至汉代，曾置有“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和乐而起，以颂除乱而安天下之功德。据《汉书·礼乐志》说：“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

按照古人对“武”字结构的分析，“武”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上的要求，或者说就是一种美德。春秋时代的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能使国家和人民免于干戈之苦难的“武”，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随着武德文化的发展，武德的内涵不断充实。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武德主体层次，既有其共同的武德本质，亦有其不同的武德个性特征。

（二）军人的价值担当

军人的价值是在军人所处的价值关系中定位和展现的。中华武德文化揭示，军人价值的大小，主要表现在价值主体即氏族、民族、国家和人民对军人（即价值客体）的需要以及军人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军人的价值问题，是武德文化的核心问题。管子强调，军人的价值在于使君主获得和保持至尊地位，使国家安全得到保证，即所谓“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②孙武把兵革之事视为决定国家、民族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认为军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安国”与“保民”；“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人价值最理想、最完美的实现形式。孔子充分地看到了军人的价值，提出了“足食、足兵、民信”的安邦定国方略，他的军人价值观是“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和“霸诸侯、一匡天下”，使民“受其赐”。老子虽然痛恨战争，但看到了“哀兵必胜”的规律，因而极为重视“哀兵”的价值。墨子虽然提倡“非攻”，但主张以兵“救守”。孙臧将军人的价值视为“战胜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管子·参患》。

而强立”之本。商鞅提出“农战”兴国说，把养兵用战视为振兴国家的两件大事之一。《吕氏春秋》把“义兵”视为“天下良药”。“戚家军”以“卫国保民”为宗旨。孙中山说“盖闻捍族卫民者，军人之天职”。^①

孙中山明确提出军人价值的概念：“军人与国家之关系，各军人对于人民负完全保卫之义务，务望各尽其义务，以保军人之价值。”^②在孙中山看来，要永葆“军人之价值”，就要正确认识、定位军人与国家、军人与人民的关系，完全尽到保卫人民之义务。

总之，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宁，是军人价值的最高目标；此目标的实现就是军人核心价值的实现。所谓“安不忘危”、“安不忘战”，就是说天下虽安，但不要忽视、轻视和无视军人的价值。在中华武德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几度出现过弭兵思潮，但始终不能成为气候，而且一旦出现即遭到痛斥。不过，安而忘危、轻武鄙兵的史训却依然几经再现。应该说这也是中华武德文化宝库中不可忽视的珍贵部分。

（三）战争观的正义视域

中华武德文化对于战争的性质，是从伦理道德（即正义性）的层面上来作出是非善恶判断的。夏、商、周时期，多以顺天承命的“天授兵权”理念来申明战争的正义性。夏启伐有扈氏时声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③商汤伐夏桀时声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④。武王伐纣时，也把自己的兴师宣称为“惟恭行天之罚”。至春秋时期，孔子倡仁战，最基本的标准是“征伐自天子出”和“爱国”；孙武“仁战观”的最高理想价值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子主张“不以兵强天下”，倡导军事“守柔”主义，反对“为主”，力主“为客”之道，实际上是反对打第一枪，支持自卫还击。战国时期，墨子反对侵略性的攻伐战争，支持伐有罪之国的“诛”伐之战；吴起以“举顺天人”作为正义战争的标准；孙臆主张战而“有义”；孟子也是“仁战”论者，其判别标准是“吊民伐罪”，提出了“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命题，力倡仁义之征，反对不义之战；荀子主张养“仁义之兵”，其战争观是以“仁”为本的；商鞅的战争伦理观的基本出发点是

① 孙中山：《通告海陆军将士文》（1912年1月1日）。

② 孙中山：《在济南军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9月27日）。

③ 《尚书·甘誓》。

④ 《尚书·汤誓》。



“以战去战”；《吕氏春秋》主张“先德后武”，兴“义兵”，认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六韬》则以“利而服之”为义战的标准。秦汉以后，历代农民军则以“求生存”为价值目标，多是假借神意天理（如“替天行道”）以申明农民革命战争的合理性；诸葛亮的战略伦理观是以“攻心”为上，信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之道；《太白阴经》强调用兵“非信义不立”，主张以“道德仁义”为用兵之本；《权书》虽然尚谋，但仍强调“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宋元明清时期，战争观的主导倾向是反对外族侵略。鸦片战争以后，则以反帝救国为仁义战争的根本标志，诚如孙中山所说：“军人之仁”，其目的“在于救国”。^①

概而言之，在中华武德文化视域里，战争有两种性质，即正义与不义（非正义）。尽管各家学派对正义与不义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即崇尚正义战争，反对和制止不义战争；正义战争必胜，仁义之兵无敌。

二、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基本规范体系

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史上，关于武德体系方面的论述极为丰富，其规范之多，条目之细，释义之详，是其他史学中不多见的。就其主要而言，可概括为以“忠”为根本、以“仁”为核心的“忠、智、信、仁、勇、严”六大规范。

（一）“忠”

“忠”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最常见、最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规范之一，是武德素养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军中英杰立身之根本、价值之基石。“忠”作为武德的基本价值规范源远流长。历代军事家无不强调“忠”在军旅生活中的价值。《六韬》提出军人要具备“勇、智、仁、信、忠”五德。《太白阴经·善师篇》中说：“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草庐经略·将勇》指出：“习勇之道，一曰忠义，二曰利害，三曰见定。”诸葛亮强调“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因此“即戎之不可不教”，必须“教之以礼义，海

^①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之以忠信”。戚继光强调军人要“倡忠义之理”。《吴子兵法》说：“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忠”是贵于生命的最高荣誉：“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为赢得“百世荣”，历代志士仁人、忠烈将士都能做到“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

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史上，“忠”的含义有二：（1）忠于国家。《左传》中说“临患不忘国，忠也”。又说“辞不忘国，忠信也”。诸葛亮在《将苑》中提出的“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是对军人之“忠”的最好概括；历代英杰精忠报国之举，是对“忠德”的最好诠释。（2）忠于职守。《论语·颜渊》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孙子兵法》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所谓“辅周”，就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对军人忠于职守作了比较全面的解读，他认为，要“以不二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尽一尺之用”；“须将所守疆域，时时放在心上”。总之，就是时时处处都要想着自己的职务，履行自己的职责，用那种“如一事未完，即忘其饥劳，务必终之，不拘夜半”的精神来勤职敬业，用心做事，奉公守范。

（二）“智”

“智”是春秋中后期的重大发现。春秋前、中期，军中多以“仁、礼、勇”为武德理想，而“礼”居于三德之核心。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就集中反映了这种武德境界。至春秋末期，“智”逐渐取代了“礼”的地位，如孔子、申包胥都讲“智、仁、勇”，《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五德。由于春秋末期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武器装备的变革，职业军人队伍的迅速膨胀，军事教练的日益强化，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等，战争越来越趋于残酷。因此，固守那种列阵拼杀的“不鼓不成列”之类的军礼，只会给战争双方带来更大的伤亡，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于是以智取胜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被重视。“智”最终代替了墨守陈规的“礼”。

武德之智含义有四：（1）精武艺。《论语·子路》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孔子的六大教育科目（礼、乐、射、御、书、数）中，就有“射”和“御”两大军事科目。戚继光倡导“习武艺”的武德人格，鼓呼“艺高人胆大”。（2）重计谋。计谋是武德之智的原始内涵。《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开篇立论说“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以诈立”，主张“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3) 辨利害。《孙子兵法》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中山说:“须知军人之智,在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① 武德之智,既包含练兵精武、计谋制胜,更赋予“明大是大非、权利害得失、谋大胜全胜”的价值追求。这是更高层次的智德。

(三) “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信”作为价值规范被广泛重视,起于春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诸侯互相侵伐。为了社会安定,“信盟”的价值被发现,士大夫、诸侯常“盟以昭信也”。至春秋末期,“信”已成为全社会认同和推崇的价值理念。孔子把“信”作为人的立身和治国之本,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国历代兵家在注重谋略的同时,都非常重视“信”的价值。《孙子兵法》把“信”视为治军用战的规律、军人必备的武德之一。翻开中国历代兵书长卷,几乎无篇不言“信”、无“信”不成“法”,如必信必果、上信下诚、信以守城、诚信宽大、义诛信行……信是决定治军成败、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其它价值规范不可替代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不信,必不捷矣”,《孙臬兵法·将义》讲“不信则令不行”。商鞅“立木取信”,吴起“徙辕立信”,其价值启照千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而丧身骊山,唐军毁白犬之盟而结怨吐蕃,其凶祸镜鉴后人。“信”的价值可见一斑。

武德之信的涵义有三:(1) 立信于军。这是对军官的要求。作为军官,首先要赏罚有信,信如四时;其次待士卒、部下,要示之以信,劝之以诚,恩信佐威,礼信亲爱;再次“用人无疑,唯才所宜”。(2) 诚信于上。这是对下级的要求。《孙子兵法·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只有下级信任上级,才能真正实现“上下同欲”。(3) 取信于民。这是对军队群体和领军人物的要求。商汤兴兵放桀,发誓于民:“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得民心而一战亡夏桀;刘邦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深得民信,关中人民“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此皆取信于民所至。

(四) “仁”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之“仁”的创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价值发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新开了文明先河。“仁”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核心,是武

^①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德文化规范体系中最元典的价值规范之一。武德因仁而立，仁因武德而兴。“仁”的概念产生于西周，“仁”的价值力倡于春秋。但是，早在武德文化发轫之初的黄帝时期，“仁”的价值就已经被发现。黄帝时期，“仁”作为武德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对推动中华民族的联合崛起发挥着伟大的价值导向作用。《龙鱼河图》说“黄帝仁义”，《韩诗外传》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之仁勋首先在武德中凸现出来。据《龙鱼河图》载，黄帝征伐蚩尤是因为“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义”。由于黄帝的武德仁勋，使“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异族部落之间的大融合、大团结，为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总结古代治军用战规律的兵书《司马法》，首篇即是《仁本》，首句即是“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司马法》“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

武德之仁的含义有四：（1）利国爱民。《国语·晋语一》说“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孔子评价管仲、《司马法》的“仁本”论等，都是坚持这一标准。陆游的“一身报国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是出于利国爱民之仁。孙中山认为，“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发扬博爱（亦即“公爱”）精神，就是要“以成救国救民之仁”。（2）畜义丰功。《国语·周语中》说“畜义丰功谓之仁”。楚庄王的“保大、定功、安民”等七项武德规范均是功利性的要求。所以《国语·鲁语上》说“夫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说“度功而行，仁也”。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建立功勋和荣誉，就是武德之仁。（3）珍爱生命。《孙子兵法·谋攻篇》主张“全卒为上，破卒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战争价值追求。诚如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珍惜生命不是怕死，更不是不杀人。《司马法·仁本》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为了多数人的安宁，杀戮少数人是符合仁的原则的。（4）爱卒善俘。孙武从“仁爱”出发，提出“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卒善而养之”。《司马法·仁本》说“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爱卒善俘的仁爱思想，已成为中华武德思想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五）“勇”

“勇”是最具有鲜明武德特性的价值规范。《墨子·修身》认为，“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勇”的价值就在于取得胜利，故谓之“勇胜”。《孙子兵

法·势篇》说，“怯生于勇”，又说“勇怯，势也”。从不同层面划分，“勇”有诸多类型。《荀子·荣辱》分“勇”为四类，即有狗彘之勇，有贾盗之勇，有小人之勇，有士君子之勇。认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提倡的“勇”，主要有两种类型：（1）仁勇。仁勇与小人之勇相对立。《国语·周语中》说“以义死用谓之勇”。《左传·文公二年》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即只有“以死共国家之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勇。但是，勇而不仁，“轻死而暴”，则是小人之勇。（2）智勇。智勇与愚勇、鲁勇、悍勇相对立。孔子力倡智勇，反对愚、鲁、悍之勇。《论语·述而》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孙武认为“怒而兴军”、“愠而致战”之“勇”，是失“仁”失“智”、“必死可杀”的匹夫之勇；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军人应当具备的武德之勇。孙中山认为，军人之勇是“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

（六）“严”

“严”是治军带兵须臾不可离的法则，为克敌制胜之关键。杜牧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对武德之严作过精辟解读，“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中华传统武德倡导的“严”，以仁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严而不仁谓之暴，仁而不严谓之溺。项羽军中多叛将，失之于暴；李广营里出骄卒，失之于溺。严而合范、仁而有度的岳家军、戚家军为千古传颂。

武德之严的含义有三：（1）人格威严。即指军官要有至上的权威人格力量和严肃的作风，能使三军令行禁止。如《孙子兵法》所云：闻金鼓之声，望旌旗之示，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2）治军善严。即军官要敢于和善于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教练、法纪严明，做到师出以律，军令如山。故《孙子兵法》强调指出：“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因此，要“修道而保法”，“正以治”，公正严明，信赏明罚，树立将帅和法纪的权威。（3）严位守职。《司马法》专设《严位》篇，主旨讲军人在战阵中的严格定位和恪尽职守的要求，强调军人的职责必须严格规范，严位守职才能保证三军一人、齐勇若一。（4）严于律己。“严”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不仅在于“严”的方式、“严”的作风，还表现在高度的自律精神和鞠躬尽瘁的责任感、使命感。治军带兵不能只靠严刑峻法，还要靠将帅人格的力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